

唐宋古文金代传承论

王 永

内容提要：金代散文直接承继辽、北宋，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宗欧、宗苏、宗韩、宗庄等不同风潮，其间经历了对宋文、唐文乃至先秦散文传统的比较和选择，有一个由近及远、由儒学到多元的学习和扬弃过程。金代文坛的创作与南宋散文异轨而并驱，进一步稳固了唐宋古文范式，并共同将其传递到元代。

关键词：金代 古文 韩愈 欧阳修 苏轼

当代学者对金代散文的研究成果不多。周惠泉在《金代文学论》中专设一章评述道：“金代上承辽与北宋，金文也接轳继轨，借鉴唐宋古文运动‘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积极成果，沿着反对浮华轻艳文风的健康道路继续发展”，“金代散文上继唐、宋，下开元、明，特别是对元初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①王琦珍把金、元散文特点概括为“文擅韩欧”和“道从伊洛”^②两个方面，这又是从古代散文发展内部观察到的真知灼见。《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云：“在散文史上，金、元散文正处于由唐、宋顶峰下滑的阶段。其成就较唐、宋要低得多，但又与其他文学体裁同样有自己的特点，有值得称道的成就，成为贯通唐、宋与明、清散文的重要环节。”^③可见，离开对唐宋古文的接受和传承这个立足点，是不能对金代散文的地位和贡献做出全面评价的，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对金代散文做些梳理。

“国朝文派”与宗欧风潮

金代立国初年，阿骨打就注重吸纳和笼络一些早已成名于辽、宋的文士，让他们来负责实用文字的撰写。辽国降臣韩昉和宋廷使者宇文虚中是这个时期两位杰出的文士代表。韩昉在辽国时已经官至乾文阁待制，入金后致力于朝廷文诰的撰写，自然将辽文的一些特点带入金初文坛。辽文有浓重的唐文特色，韩昉也是笔力雄劲。但是在他之后，宇文虚中等由宋入金

① 周惠泉：《金代文学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60页。

② 王琦珍：《金元散文平议》，《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

③ 张晶主编《中国文学通史·辽金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的文士开始接掌翰苑,宋文的平易特色又迅速在金朝发展起来,再加上他们的后辈文人蔡松年、吴激、施宜生等人的努力,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将金代散文渲染增加上宋文的底色。

自熙宗皇帝和海陵王起,朝廷开始注重文教,辟馆兴学,金源文化渐成一脉。到了世宗、章宗时期,金代散文的风貌更加完善。“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①一个王朝总要建设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自太宗时代起,金朝的科举制度就渐渐建立,熙宗、海陵王、世宗时期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更是鼓舞了文人散文创作的热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提要云:“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②自金世宗时期开始,金源散文融合唐、宋,在雄健底色上辅以平易文风的特色也已经形成。大定(金世宗年号)以后,作家笔力饱满,直继唐宋诸贤。

蔡珪、王寂等人是金代文坛的第一代宗主。宋朝降臣蔡松年之子蔡珪,人称“国朝文派”之宗。虽然蔡珪文集已经失传,不过元代郝经曾赋《书蔡正甫集后》一首,其中云:“共推小蔡燕许手,金石瑰奇近世无”,“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摩欧苏”^③,从中可以想见其文章风貌。

据《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明昌二年,“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④。此期以党怀英、王庭筠为代表的第二代国朝文士开始执掌文坛。他们更加明确地追摩欧阳修等人的创作,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党怀英,号竹溪先生,少年时师从刘瞻,与辛弃疾有同学渊源。党怀英在文风上最具有欧阳修的“六一风神”,稍后一代文坛盟主赵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云:“自公未第时,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谓入馆阁后,接诸公游,始知为文法,以欧阳公之文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⑤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党怀英对欧公文风的追摩,是在文坛一种集体风气背景下的主动选择。元好问则继承赵秉文的评论说:“公(党怀英)之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⑥概括言之,党怀英的文风倾向于不尚虚饰、不求新异、重在达意、因事遣词、平易晓畅的欧文风格。

党怀英之后的文坛领袖是王庭筠。元好问在《王黄华墓碑》中称赞他“为文能道所欲言,

①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3页。

② 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58页。

③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

④ 脱脱等撰《金史》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页。

⑤ 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

⑥ 元好问编《中州集·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0页。

如《文殊院斫琴》《飞来积雪赋》及《汉昭烈庙碑文》等,辞理兼备,居然有台阁体裁”。^①唐宋古文名家之中,欧阳修散文是馆阁文风的代表。细观王庭筠古文,学习欧阳修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据《金史·文艺传》记载,章宗对王庭筠的文章有过批评:“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②。所谓的“句太长”、“语句不健”,如果细细追究,欧、曾文有之,而三苏及王安石则无此病。苏轼文风爽利、王安石文风峭刻,都无冗长问题。这反倒说明他在古文创作上的欧文偏好。

南渡文坛:由宗欧到宗苏

继章宗即位的卫绍王统治时期,金朝已经是内忧外患不断——内有权臣骄横跋扈,外有蒙古大兵威慑。金代文学的主题已经在悄悄转移。宣宗即位,蒙军进攻中原,金兵战败,宣宗不顾举朝反对,听信败将的建议,将都城迁往黄河彼岸的北宋故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此后虽国势日颓,然而文风却由中期稍显靡弱的状态变为忧时伤乱。

金室南渡后的文苑领袖是赵秉文、杨云翼等人。他们在理论上以韩、欧并重,但是在实际创作上还是以欧、苏的平易风格为主,并没有韩愈的尚奇追求。

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云:“六经,吾师也。可以一艺名之哉?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子云、韩愈、欧阳修、司马温公,大儒之文也,仆未之能学焉。梁肃、裴休、晁迥、张无尽,名理之文也,吾师之。”^③可见韩、欧二人在赵秉文的接受视野里,是从儒学先贤的角度上被并称的。在另一篇《答麻知几书》中,他阐述了对当时学术风气的不满和对韩、欧文的推崇:“足下所喜韩子、欧子之学,固为纯正,如退之《感二鸟赋》《上宰相三书》,亦少年未知道时语也。其后《谏佛骨》《南迁》,若与生死利害相忘者然。《过黄陵庙》求哀乞灵,恐死瘴雾中,亦学圣人而未至者。今人士子,以缀辑声律为学,趋时干没为贤,能留心于韩、欧者几人?”^④赵秉文对士子的批评,颇有以嘉祐二年欧公革新文风的事迹为己任的味道。在文风建设上,赵秉文也有扭转大势的勇气。在为党怀英撰写的神道碑中,赵秉文总结了对韩、欧文风差异的认识:“韩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长江大河,浑浩运转,不见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视。欧阳公之文,如春风和气,鼓舞动荡,了无痕迹,使读之不厌,凡此皆文章之正也。”^⑤在韩、欧之间,他更推崇的是欧阳修。

前引赵秉文的文论代表作《竹溪先生文集引》主要是就党怀英的文集进行评价,但也借

①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一六,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5页。

②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二六,第2731页。

③ 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第230页。

④ 同上,第233页。

⑤ 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一,第163-164页。

此表达对欧文的看法与推崇,提出“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的主张。这是对欧、苏文论的引申,倡导因事遣辞、随物赋形的达意之文。他就党怀英的成就问题发表议论,同时肯定了欧阳修文章风格的地位:“亡宋百余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难之语,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叠叠不厌,盖非务奇尚高,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①他说欧文有平易闲雅之风是没有问题的,不以务奇为尚也符合欧阳修的文风追求,但说欧文“约而不失一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是过高的赞誉。自金末的王若虚开始,文坛上对欧阳修的繁冗之弊已有很多批评。在赵秉文等人的倡导下,金代中后期的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尊欧的风习。除了在赵秉文作品中提到的党怀英、麻知己以外,杨云翼、王若虚、元好问、刘祁等著名作家也给欧文以极高的地位,但实际创作上的表现却稍显复杂。即以赵秉文自身而言,他也是尊欧亦习苏,据刘祁《归潜志》中的记载:“李(纯甫)尝与余论赵(秉文)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失枝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②这虽是同时代的一种讥讽,但也透露出一定的信息,观赵秉文的赋作,模仿苏赋得痕迹很明显。

王若虚是赵秉文与元好问之间的文坛盟主。其《滹南遗老集》有《文辨》四卷,专评历代文章,尤其以韩、欧、苏为主。王若虚亦以习欧学苏为创作宗旨,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称王若虚“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颇能似之”^③。他的创作无韩、柳之奇崛深厚,而偏于欧、苏的流畅、睿智。由于北宋战败者的身份,金代的学者们在接受其创作上影响的同时,往往能够跳出盲目崇拜的误区,认识得更加深刻。自金末王若虚起,金代的学术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能够脱略出宋儒的因循桎梏,发表独特的看法。不同于宋人及金代中期党怀英和赵秉文等人对欧文笼统的推崇,王若虚对欧阳修散文在肯定中有批评:“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五代史论》曲折大过,往往支离蹉跌,或至涣散而不收,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如《吴越世家论》尤甚也。”^④王若虚认为:“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憾矣。”^⑤“和气”和“英气”主要反映了欧阳修散文的情感性和苏轼散文的创新性各自之长,在此文中他又引党怀英的话评述道:“党世杰尝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诘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⑥可见与党、赵不同,王若虚

① 赵秉文:《闲闲老人滹水文集》卷一五,第205页。

② 刘祁:《归潜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

③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一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43页。

④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六,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

⑤ 同上,第413页。

⑥ 同上。

更为推崇的是苏轼的散文。金代中后期文坛的文学接受历程,与北宋中后期由欧文到苏文的过渡,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轨迹。

宗韩作家与多元化文风发展

随着金代中期文教的发展,古文在民间的酝酿则越来越深厚。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地文化事业的重建工作已经激发出大量以儒道为基本内容的古文作品,另一方面是文士们开始重视和传授古文,比如王若虚的老师刘中。刘中字正夫,明昌五年(1194)词赋经义进士,“赋甚得古人句法,尤长于古文,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教授弟子王若虚、高法飏、张履、张云卿,皆擢高第,学古文者翕然宗之曰‘刘先生’”。^①刘中是较早推崇韩柳古文的金代文学家,对文风多元化演变颇有先导作用。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淳南遗老集四十五卷》提要云:“《文辨》尊苏轼而于韩愈间有指摘。”^②如前节所述,在欧、苏的评价上,王若虚是崇苏而抑欧,但是表现出相对公允的一面;可是在韩、柳之间,尽管他也称“呜呼,为诗而不取李、杜,为文而不取韩柳,其识见可知矣”^③,但还是旗帜鲜明地以韩文为上,甚至有失偏颇。试看其围绕韩愈《平淮西碑》进行的一番讨论:

柳子厚谓:“退之《平淮西碑》犹有帽子头,使己为之,便说用兵伐叛。”此争名忌刻,妄加诟病耳,其实岂必如是论?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说,凡有议论人者,辄援是以驳之,亦已过矣。

刘禹锡评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头便曰‘韩弘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乘书将中军乘麾佐之之势也,又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呜呼!刘、柳当时讥病退之,出于好胜而争名,其论不公,未足深怪,至于文昌之作,识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锡以不情之语妄加推奖,盖在倾退之,故因而为之借助耳,彼真小人也哉。^④

在这里,王若虚为维护韩愈而贬抑刘、柳,甚至将刘禹锡甚至评为“小人”,说刘禹锡是用肯定段文昌同题文字的方式来打击韩愈。

在直接评价柳文的段落里,王若虚也显得批判性过强,云:“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无聊,不胜愤激,故触物遇事辄弄翰以自托。然不满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

① 元好问编《中州集·丁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页。

② 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第2200页。

③ 王若虚:《淳南遗老集》卷三七,第424页。

④ 王若虚:《淳南遗老集》卷三五,第401-402页。

《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苦无义理，徒费雕铸，不作焉可也。《黔驴》等说亦不足观。”^①在稍微公允一些的评语里，王若虚也说：“子厚才识不减退之，然而令人不爱者恶语多而和气少耳。”^②其实，说柳宗元“恶语”多而“和气”少是事实，但韩文岂少“恶语”？相比而言，柳文依托寓言式的文体来表达还比韩文的直接批判来得委婉些。说到“和气”，是欧、苏为代表的宋文才说得起洋溢荡漾的。

在金末，王若虚在唐文上尊韩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个极有力的应和，那就是在创作上，文士雷渊“渡河后，学益博，文益奇，名益重”^③。刘祁云：“公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序事。”又云：“尝为文祭高公献臣，其词高古，一时传诵。工于尺牍，辞简而甚文，朋友得之，辄以为珍藏。”^④可见他是习韩作家的代表。

雷渊的老师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其《重修面壁庵碑》自称：“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业以应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⑤他是金代后期专以文章名世的杰出作家，年长一辈的文坛领袖赵秉文也自称“经学与文章不及李之纯与足下”（《答麻知几书》）^⑥。李纯甫有一种刻意求新求奇的文学观念，“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⑦。他为文专尚奇古一体，这是形成他文章个性风格的因素，也是使他没有像赵秉文那样的文坛宗主的原因。但他为后期的金代文坛带来了风气的新变，“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⑧。李纯甫对当时的文章风格影响是最大的。“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⑨。他确是南渡后文风奇古之宗。李纯甫与雷渊与师生一起倡导了金末文风的“奇古”运动。“奇古”追求与王若虚的“平淡”追求两种散文观念在文坛上的论争，其实也代表了宗宋与宗唐、宗古主张的一次文风较量。

当然，更多金代作家还是并尊韩、欧的。周昂（？~1211），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大定年间进士，曾拜监察御史，章宗承安元年因荐举赵秉文事件受牵连出为隆州（今吉林农安）

①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五，第404页。

② 同上。

③ 元好问编《中州集·丁集》卷四，第314页。

④ 刘祁：《归潜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页。

⑤ 同上，第7页。

⑥ 赵秉文：《闲闲老人滹水文集》卷一九，第233页。

⑦ 刘祁：《归潜志》卷八，第87页。

⑧ 刘祁：《归潜志》卷一，第6页。

⑨ 刘祁：《归潜志》卷八，第85页。

都军,复召为翰林,后从宗室承裕军戍边,城陷,没于蒙军。周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南渡后诸大家皆曾师尊之,李纯甫称他“真韩、欧辈人也”^①。

韩、欧并尊的代表人物,还有元好问。由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肇端的“古文运动”,经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推动达到高峰,到了金末,元好问又集其大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环节。元好问的学生徐世隆说也评价其师:“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②元好问自己说“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四)^③一直到清代,学者们对元好问作为继承韩、欧文风的金代古文集大成者并无异词。清人庄仲方云:“及其亡也,则有元好问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继唐、宋而下开元、明,与李俊民、麻革之徒为之后劲。迹其文章雄浑挺拔,或轶南宋诸家。”^④可见元好问以毕生的创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总体而言,在金代作家看来,韩、欧、苏代表了唐宋古文的最高典范,接续韩、欧、苏的文脉成为金代作家创作上的追求,也是对他人的较高期许和评价。他们在民族观念上摆脱了前辈的精神负担,俨然以大金臣子自居,在行文风格上多具有以欧、苏文为代表的平易晓畅的宋文特征。

本文系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宋古文金元传播接受史”(项目编号:12YJC751087)阶段性成果。

(王永,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责任编辑:吴 刚】

① 刘祁:《归潜志》卷二,第 13 页。

② 《元好问全集》卷一,第 1 页。

③ 《元好问全集》卷一,第 13 页。

④ 庄仲方:《金文雅·序》,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辽文存、金文雅、元文类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07 页。